

用另一种语言写作

文 / 阿光

现代社会，很多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多语言的环境中，与家人说的方言，日常工作社交时说的普通话，还有求学时所学的外语，共同造就了人们的思考和表达体系。但对有些人来说，最喜欢、使用起来感觉最舒服的语言，却未必是母语。人和语言之间，可能是因为节奏和韵律，也可能是因为语言中蕴含的思维方式，或者仅仅因为一段特殊的生活体验，于是电光石火，一段情缘就此展开。

作家们有时候会更任性一些，近年来突然由英语转向意大利语写作的裘帕·拉希莉就是这样。裘帕·拉希莉1967年出生在美国，父母都是来自孟加拉国的第一代移民，尤其是她的母亲，没有在美国接受过教育，也没有自己的事业，是被盛在婚姻的容器中直接“移植”到了陌生的国度。也是因为母亲，拉希莉幼年时得以完整地体验母国的生活方式。她的父母在小家庭中打造了一个只说母语的环境，保留了孟加拉国的各种节庆仪式，那是他们对抗强势文化冲击的方式。这样的环境对拉希莉的影响是，

她对英语和孟加拉语都无法产生认同，“我意识到我必须把两种语言都说得相当好，一种用来取悦父母，另一种用来在美国生活，我悬停在两种语言之间，被它们撕裂。语言的来来去去让我迷惑：这好像是个无法解决的矛盾。”

很难说这是语言问题还是生存状况的问题。但无论如何，身处夹缝中的拉希莉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奇迹。2000年，她用英文写出了首部短篇小说集《解说疾病的人》，并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，她也成为该奖项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。至于写作的主题，

拉希莉则全部献给了孟加拉人的移民生活，其中的故国来去、代际牵绊、爱恨情仇，以及家庭生活在文化碰撞中结出的小小苦果，都被她演绎得纠结而深沉。这世界上写移民的故事何止千万，但拉希莉的故事最让人放心不下，那些因巧合而暂时达成的平衡，那种只敢看向表面却不能深究的张望，写出了多少人生活的况味。

所以，不再写移民故事的拉希莉，多少让人感觉遗憾。但她的自我流放并没有停止，这一次似乎走得更远。

1994年，拉希莉去意大利旅行，对意大利语产生了一见钟情式的热爱，并开始了学习这门语言。2012年，她移居罗马，为了适应新的移民生活，她很决绝地放弃了全部英语阅读。2015年，拉希莉在《纽约客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讲述了她学习意大利语的经历，她同时宣布，意大利语此时是她写作的唯一语言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意大利语作品《罗马日记》。

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，这是一





一个相当大胆的决定，甚至不啻于一个“自杀式”的决定，因为造就作家的是语言，放弃一门熟练使用的语言也意味着放弃风格，甚至是放弃写作的主题，更不要说远离多年来培养的读者群了。文学史上也有许多放弃母语、以其他语言从事创作的作家，如纳博科夫和米兰·昆德拉，但他们大都有一个被迫流亡的经历，即便是纳博科夫这样的语言天才，在谈起英文写作时，也不无遗憾地说：“我的英语，我一直都拥有的第二个工具，却是个相当僵硬的、人工的东西。用来描述一场日落或者一只昆虫可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当我想知道从仓库去商店可以抄哪条近路时，却无法掩饰句法之弱以及本土词汇之贫乏。”

但是，简陋、贫乏、不安全感、不确定性，对写作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救赎。

写作是把生活转化为语言的艺术，用语言留存画面、破解秘密，从而消除生活那令人战栗的复杂性和不可理解性。但是，当人使用一门过于熟稔的语言时，这一转化过程往往显

得过于便利、迅疾和理所当然，而文学创作，恰恰是要拒绝这些。拉希莉在《罗马日记》里写道：对一门语言的理解越深，它就越令人困惑。离得越近，距离它反倒可能越远。而一门陌生的语言则让人时刻把“不可能”放在心头，意识到有些事情不可能做到，是一个人创作冲动的内核，面对一切不可企及的事物，都让人惊叹不已。没有对事物的惊奇感，没有这种惊叹，人就无法创造任何东西。

目前，拉希莉已经用意大利语写出了第二部作品《身在何方》，她亲自把它翻译成了英语。跟以往密实纠

缠的文风相比，这本书的风格轻盈而现代，主人公是一位四十岁的单身女性，她依然受到亲情友情的牵绊，但这一次绳索好像松绑了，她能够忠于自己的视角，诚实地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。在剥除了母语的重负之后，拉希莉笔下的人物似乎也获得了更多行动上的自主性。

也许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语言中的流亡者，语言安顿我们的身心，又永远无法抵达我们最核心的秘密。只有通过一次次的流放和出走，我们才能不断修正自己和语言的关系，拓展生命表达的可能性。■